

# 论从周刊

## 改革开得万世功

### ——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20周年

□ 李海青

中央层面党的建设的实际，邓小平的论述可谓句句实在，点到问题的要害。正如邓小平预料的：“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稳稳定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 “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改革的基本路线方面，邓小平强调要围绕一个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毋庸赘言，邓小平对两个基本点的强调在今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实行改革开放是为了打破封闭僵化的苏联模式，在老路不通的情况下探索一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人民富裕和国家富强的新路。要推动改革开放就必须防止力量强大的“左”的干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为了避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保证走社会主义的正路。“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任何时候我都没有让过步。”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要警惕右的干扰。“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坚持改革开放，既要警惕右，又要防止“左”，两个基本点归结到一起，就是要实事求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寻找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道路。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两个基本点即是两条边界，其相互支撑，不仅决定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形成，而且实际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前景，开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张力空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不犯方向性错误的路线保证。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两个基本点的这种张力空间中所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就是既不“左”又不右的中道，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两个基本点的辩证思维将会长久影响中国以后的改革与发展，对于今天中国的思想分化与争鸣也不无深刻的启示意义。

### “我们确定了一条方针，就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改革的策略方法方面，邓小平强调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同时要发挥民众的积极性。胆子要大是就战略而言，是指要打破思想禁锢，认准了就要坚定不移搞下去，而不能裹足不前、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步子要稳是就战术而言，是指在认准方向后的具体探索过程中，要稳妥慎重、及时总结回顾，决不能鲁莽行事，这样才能够避免大的失误。“胆子还是要大，没有胆量搞不成四个现代化。但处理具体事情要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小错误难免，避免犯大错误。”“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宏伟的发展规划是有风险的，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确定了一条方针，就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总结一步的经验，对的就贯彻下去，不妥当的就改。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我们的路是漫长的，还会遇到许多困难，错误也是难免的。关键在于不断地总结经验，使我们党的生活民主化，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这样就能听到更多人的意见，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意见。”邓小平的这一策略方法不仅适用于改革之初，同样也适用于今天。尽管随着改革经验的增加以及认识的深化，现阶段改革顶层设计的作用愈益凸显，但这丝毫没有冲淡邓小平相关论述的价值。顶层设计的科学性本身需要经过实践检验，顶层设计细化之后也需要逐步探索实施。随着改革的推进，改革的领域愈益宽广，改革的复杂性与难度愈益增加，未知因素和不可测因素众多。基于以上情况，在改革全面深化的新阶段，“摸着石头过河”的必要性不是减弱了，而是进一步增强。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在改革实践中，邓小平还十分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些年搞改革的一条经验，就是首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力下放给农民。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同时广泛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乡镇企业是谁发明的，谁都没有提出过，我也没有提出过，突然一下子冒出来，发展得很快，见效也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广大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中，有效发挥了自身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今天，面临改革攻坚的严峻形势和复杂挑战，执政党更要相信民众，进一步在各方面赋权于民，给予民众更多的自由、空间与平台，持续激发民众中潜藏的创造力与热情，凝聚共识、汇集力量，如此才能实现各项宏伟目标蓝图。

“我们一定要使人民得到实惠，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从切身经验中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值得爱”

### “我们从政治角度考虑外交问题，不用打牌的方式”

改革的国际战略方面，邓小平强调不玩打牌游戏，而是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这样，我们国家的政治分量就更加加重了。这个政策很见效，我们要坚持到底。”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能够使我们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保持最大的行动自由，不受制于结盟的任何国家或集团，完全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和调整对外关系和政策。在国际交往中尤其是中美关系方面，邓小平特别强调不能玩打牌游戏。“在国际关系中，现在比较形象的语言是打牌。打牌是个手段，用打牌来达到什么目的，我始终怀疑。我们从政治角度考虑外交问题，不用打牌的方式。”“我们是从战略角度考虑中美关系的，双方都不要玩打牌游戏。打牌是不从政治角度、不从战略利益考虑的，有时甚至也不从国家利益考虑。如果是打牌，牌就可以随时换，也可以随时丢掉。从战略的角度、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才能有个稳定的政策。”“我们不打别人的牌，就是说不打苏联的牌，也不打美国的牌。我们也不让别人打我们的牌。”不玩打牌游戏，也就是说，在国家之间的交往中，不能局限于一时一事之私利，不能耍手腕、玩花招，不要搞外交手法；而应从长远角度、战略高度，注重构筑相互尊重、持久互利互信的关系架构。这是最根本的，也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认真思之，邓小平的精辟论述对于今日中美关系之处理应该说仍有极具针对性的指导意义。



## 谈心谈话 贵在真诚

□ 刘在刚

落实好谈心谈话制度，需要领导干部强化党章意识，超乎“角色”之外，放下身段，敞开心扉，见人见事见思想。

六中全会指出：“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毫无疑问，这两个“必须”鲜明地界定了管党治党的有效途径——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就党内政治生活而言，党的组织生活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和载体，也是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重要形式。党的各级组织都要严格执行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确保党的组织生活经常、认真、严肃。但是，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当中的谈心谈话制度的落实，并没有引起一些党组织的足够重视。有的党组织，尽管能够开展谈心谈话，但不经常；有的党组织，虽然做到了经常性地开展谈心谈话，但效果不尽人意；有的党组织，把谈心与谈话混为一谈，缺乏针对性；有的党组织，谈心谈话对象单一，覆盖不够全面；还有的党组织，借口工作繁忙，把谈心谈话制度束之高阁；更有甚者，个别党组织居然长期不开展谈心谈话。

实际上，谈心谈话制度是党内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一级党组织，通过谈心谈话制度的落实，可以有效地掌控一个单位党员干部的思想动态和心理诉求，从而增强工作的针对性。我们不难想像，如果一个单位的党组织，连自己的党员在想什么都不清楚，连自己员工的诉求都漠视不顾，怎么可能履行好党组织的“主体责任”？怎么可能发挥好党组织的“堡垒作用”？因此，各级党组织必须把谈心谈话制度重视起来，落到实处。

具体来说，谈心谈话制度包含两个内容：一是谈心，二是谈话。所谓“谈心”，就是党组织班子成员之间、班子成员与党员之间、党员与党员之间，按照《党章》规定的党员平等的主体地位，抛开领导与下属的障碍，坦诚相见，推心置腹，平等交流，以心交心。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强化党章意识，超乎“角色”之外，放下身段，敞开心扉，见人见事见思想。在这个过程中，领导又要不忘“角色”，多做为党员排忧解难的思想工作，多做为党员排忧解难的具体事情，切实让每名党员感受到自己的荣誉和归属，真正让每名党员感受到来自组织的关注和温暖，从而激发起“干事创业、勇争一流”的工作热情。

所谓谈话，就是党组织着眼于“主体责任”，以组织主体的身份经常性、有针对性地与党员交心、思想和生活，以保证所有组织成员“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切实发挥好每一名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应当把握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一般性谈话。这类谈话，就是让党员明确未来愿景、工作目标、推进措施、奖惩标准、个人平台等问题，切实解决党员精神懈怠的问题，重启这些党员的工作激情；二是，提醒性谈话。这类谈话，就是提醒一些党员“那些话该讲不该讲、那些事该做不该做”，切实解决部分党员“小错不断、大错不犯”的问题，惊醒这些党员的党性意识；三是，诫勉性谈话。这类谈话，就是对个别走在党规党纪边缘、不断挑战组织权威的党员进行严肃的诫勉，切实解决“是非观”不清的问题，防止这些党员走到犯罪的深渊。

（作者系青岛西海岸新区工委党校高级讲师、科研部主任）

□ 责任编辑 马清伟 李 檬

（作者单位：山东省委党校党建部）

## 新论语

2017年2月19日，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同志逝世20周年纪念日。邓小平逝世20年后的今天，中国改革大业一方面不断深化、成就辉煌，另一方面又处于全面深化与攻坚阶段，面临巨大阻力与挑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温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智慧论述，不仅对于当前中国改革之推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也是对伟人的最好纪念。

邓小平关于改革的论述，问题意识极强、思路系统宏阔、观点深刻明晰，针对今日改革形势，以下几方面尤其具有重大意义。

###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改革的领导力量方面，邓小平强调要聚精会神抓党建，尤其重视中央层面党的建设。邓小平认识到，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内外部各种挑战最后必然都会集中到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身上，执政党必须切实抓好自身建设，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他所强调的“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和“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实际上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另外一种说法。针对党内思想混乱、官僚作风严重，经济市场化过程中腐败现象多发等问题，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整党，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优良传统与作风，包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等恢复起来、发扬起来。确实，改革开放以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党的各种优良传统与作风由于各种原因，不同程度地被忽视甚至丢弃，极不应该！好东西不能丢，必须重新恢复、重新发扬、重新确立。这也是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思路。在党的建设中，邓小平抓住关键，尤其重视中央层面党的建设。他多次强调：“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我们是一个大国，只要我们的领导很稳定又很坚定，那么谁也拿中国没办法。”邓小平强调，中央领导集体要树立改革形象，让人民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要胸襟开阔、眼界宽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取信于民，尤其是真正反对腐败；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领导集体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需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整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联系改革开放以来直至今日

# 修复腐败重灾区的政治生态

□ 翟红芬



环境在具体要素、短期措施与长期规划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发挥作用，避免单项制度的推进并造成力量消解状况。

在腐败重灾区，党内政治生态自系统与宏观社会环境系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发生变化甚至扭曲，故而政治生态修复应把全面从严治党、铲除腐败发生的土壤、重整政治生态文化等多个层面统筹用力，使之协同推进并相互支撑。

第一，要有效遏制腐败的多发高发状况。腐败重灾区的腐败行为面广量大，有些已存在的腐败尚处于隐蔽状态，有可能成为滋生新的腐败问题的源头，解决腐败存量必须利到病除、强化威慑、猛药去疴，防止腐败行为的继续蔓延。对腐败行为应釜底抽薪，抓早抓小、标本兼治，发现问题及时查处，决不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以有效遏制腐败增量。

第二，要严肃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活状况与政治生态密切相关，有什么样的党内政治生活，有什么样的党员干部作风。腐败重灾区的党内政治生活受到严重侵害，形式化、庸俗化等现象表现突出，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在党内关系中搞亲疏远近、在利益面前结团抱伙，造成党内关系的异化。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形成良好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保证，是重塑腐败重灾区政治生态的有力武器。修复腐败重灾区的政治生态，必须严格按照《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要求，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

第三，要抓住关键少数，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作为局部政治生态建设中的关键少数，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发挥着重要作用。腐败重灾区的政治生态恶化，主要负责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一些地方发生窝案串案，有的地方成为腐败重灾区，主要负责人的责任是怎么履行的？不能‘新官不理旧账’。出了事，要追责。”在腐败重灾区的政治生态修复中，要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模范作用，着力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使党内监督与党监督有机结合，实现全方位、全过程监督。要加强责任追究，落实主体责任，以责任倒逼机制促进制度机制的完善。

第四，要建立健康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干部选拔任用是腐败重灾区政治生态修复的棘手问题，关系政治生态修复的得失与全局。用人腐败必然导致用权腐败，腐败重灾区干部制度同虚设，大量腐败现象的存在会导致逆向、错误的干部任用导向，而错误的干部任用又加重和催生了新的腐败问题的产生，形成恶性循环。在腐败重灾区政治生态修复中，必须形成正确鲜明的用人导向。要严格选拔程序，严防带病上岗，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要优化资源配置，避免“新官堕落”。

第五，要完善制度体系，立明规矩、破潜规则。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与促进政治生态不断改善的关键环节。腐败重灾区出现的种种问题，与改革滞后、体制机制不完善、以权谋利漏洞多等因素密切相关。为此，腐败重灾区的政治生态修复，应进一步完善权力运行机制。特别要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岗位的监管，如建立权力清单、防止权力滥用等。政治生态修复过程中的制度建设，要针对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重视专项整顿，完善制度设计。要通过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最大限度地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从根本上扭转窝案、串案等腐败现象的发生。

### 在腐败重灾区，党风、政风、社会风气都会发生变化甚至扭曲，其政治生态亟需修复。

政治生态，体现的是社会政治系统中主体要素之间及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联状态与总体面貌，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之优劣的综合反映。一定范围内既存的政治生态，会直接影响到党员干部的价值取向与为政行为。优良的政治生态，能够弘扬新风政风、抵挡歪风邪气，能够营造健康的从政施政环境，是我们应当积极创造并悉心维护的。然而，在腐败重灾区，腐败行为却批量出现，历时长、范围广、影响深，严重破坏了政治生态各要素之间的良性运行，造成了政治生态的严重恶化。

腐败重灾区，是指出现“集体共犯式”腐败现象，腐败行为形成窝案、串案以至成批量发生的行业、领域或地区，其腐败程度带有系统性、塌方式等标志。腐败重灾区易于造成区域内或行业内的权力长期滥用、监督系统失效、社会政治环境扭曲等，会严重影响和破坏局部政治生态。及时修复腐败重灾区的政治生态，恢复政治环境的“青山绿水”，是解决腐败重灾区诸多问题的基本前提，是促进腐败重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

修复腐败重灾区的政治生态，要把总体目标与具体要求紧密结合起来。总体目标是重构政治生态，恢复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政治环境；而具体要求或实际推进，则需要立足各该领域政治制度重建、各项专项治理理顺、各类别工作推进实施来协调共为。这意味着，修复腐败重灾区的政治生态，既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要以零容忍态度，以高压态势遏制腐败现象增长和蔓延，下气力去减少腐败存量，又要积极从正面去引导，加速集聚正